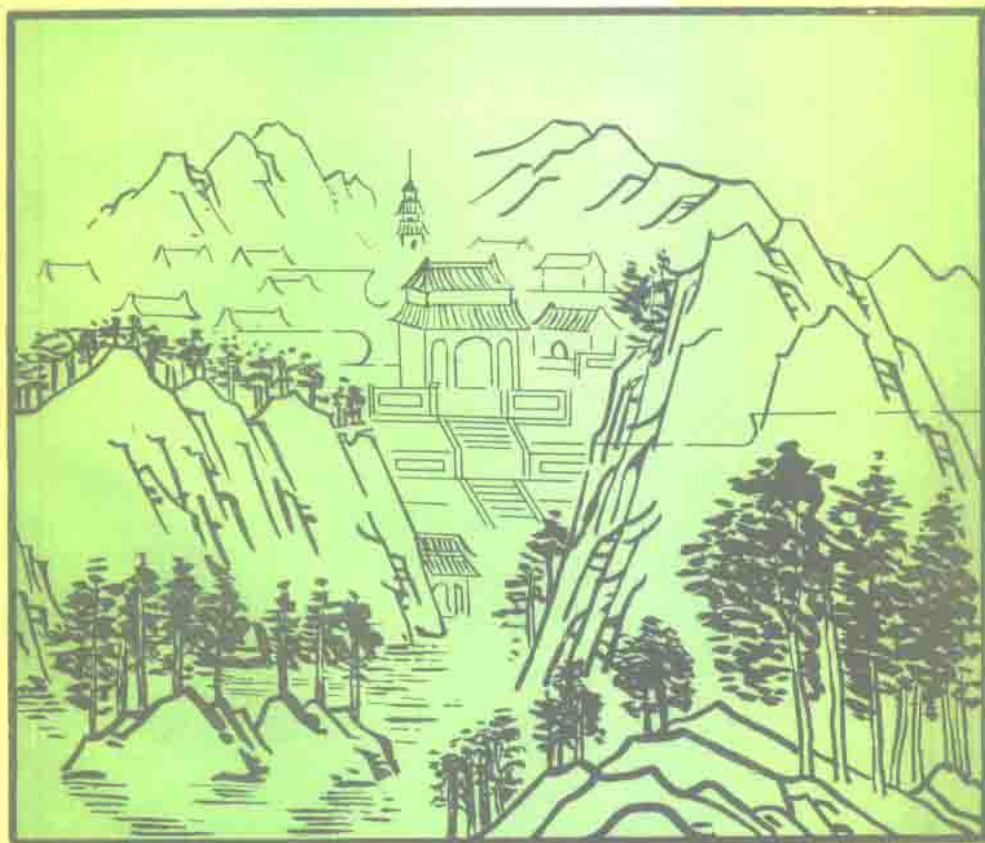


10.01

江寧春燄

第十一輯



江寧縣政協文史資料委員會
江寧縣地方志辦公室

92

主 编：竇天语
责任编辑：毛志良
封面题字：赖少其
封面设计：裴家同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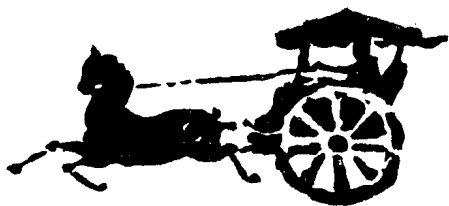
江宁春秋 第十一辑

《江 宁 春 秋》编 辑 部 编
江宁县政协文史委员会出版
金坛县二中印刷厂印刷

一 九 九 二 年 十 月 出 版

苏 宁 出 准 字 第 0266 号

· 江宁春秋 ·



五十年前，在江宁县龙都乡郭家村发生了一起革命流血事件：一九四二年三月三十一日，抗日民主政府江宁县长强博及十二位干部战士，在敌人的突然袭击中壮烈牺牲。请看本辑「碧血沃国土，烈魄耀千秋」专栏中的一组文章及「编者的话」。

然而，「江宁县与云南省相距万里，山阻水隔，似乎是『风马牛不相及』。实以及方志、史籍所载的确凿史实，揭示了江宁人与这一边陲地区的紧密关系，并且追踪溯源，作了令人信服的论证，是一篇值得一读的文章。」

本辑《考证与争鸣》栏中，一些专文对江宁历史上一些重大问题作了有益的探讨，如《江宁对南京的战略地位》、《江宁县历史人口变迁》、《江宁古文化续二题》等，从经济、军事、文化等不同角度，以史实为根据，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，一一作了发掘、分析和探索。此外如对上坊桥的考证小丹阳地名的由来等，也都言之有据，值得一读。



江宁春秋 249.1/06 第11辑

碧血沃国土 烈魄耀千秋：

——纪念邹家村事件50周年纪念

强博血染邹家村·····	刘如松	4
闪光的青春·····	毛志良	7
在与焦恭士同志共同战斗的日子里·····	夏希平	11
忆恭士·····	周 迈	13
回忆王齐贤同志·····	朱为龙	16

万众共谱抗洪歌

——1991年江宁县战胜特大洪涝灾害纪事

·····	李荣潮 陈祖贻	19
-------	---------	----

江 宁 经 济	江宁农业四十年发展概貌	
	·····	李铁石 李适克 25
	解放以来江宁农业技术的改造与提高	
	·····	张龙生 28
	江宁县私营商业改造纪略·····	冯继容 37
人 物	记史学家邓元诚·····	盛星辉 46
	纪涛小传·····	叶 根 49
春 秋	江宁人开发云南六百年·····	李久葆 52
	江宁竹枝词（十二首）·····	窦天语 57
	难忘的岁月·····	汪 洁 61

考证与争鸣:

夏完淳与疏表通海案·····	白 坚	64
江宁对南京的战略地位·····	彭年德	73
江宁县历史人口变迁·····	李存寿	78
江宁古文化续二题·····	王少华	82
上坊桥与七桥瓮·····	张鏊祥	87
小丹阳之“小”字考·····	存 寿	91
方山埭与破岗渚·····	王 引	92
为何江宁会有武则天的传说·····	江慰庐	95
为南宋方山古塔正名·····	彭年德	99

忆华东“解训团”二三事·····	韩正礼	105
------------------	-----	-----

文化走廊

江宁——民歌之乡·····	周正凯	110
开放十年中的南唐二陵·····	刘谨胜	114
近年出土的两件文物·····	文 言	118

历代诗人咏江宁·····	林 风	120
--------------	-----	-----

中国古代画家·····	刘 诗	127
-------------	-----	-----

补白：纪念邹家村事件五十周年诗一首	化 雨	18
-------------------	-----	----

碧血沃国土 烈魄耀千秋

——纪念邹家村事件五十周年

~~~~~

〔**编者的话**〕革命，是伟大壮丽的事业，也是艰苦、残酷的斗争。在抗日战争烽火弥漫江宁大地之时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四军和革命干部、革命群众，同仇敌忾，团结奋斗，向敌人展开了艰苦卓绝、气壮山河的斗争，打击了日伪的嚣张气焰，为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；但在这同时，也蒙受到不少大大小小的挫折和损失，一些优秀的中华儿女为此抛头颅，流碧血，把青春献给了抗日大业、革命大业。“邹家村事件”就是这部伟大史篇中的可歌可泣壮丽的一页。本刊本辑发表了五篇文章，以为这一事件的50周年祭。这些文章，都是当事者亲身经历的回忆纪录或综合整理。它们不仅再现了当时的壮烈情景，而且有力地昭示来者：胜利，来之不易。在我们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已经进入改革开放的年代，烈士们的鲜血和他们那种为了胜利一往无前、不怕牺牲的献身精神，必将鼓舞我们在经济建设的征程上，去夺取一个又一个的新胜利。

~~~~~

强博血染邹家村

刘如松

1942年3月31日，年仅23岁的江宁县抗日民主政府县长强博壮烈牺牲在龙都乡邹家村。

邹家村四面环水，状如孤岛，座落于水乡龙都西南约7华里、秣陵关东南13~14华里处，它的四周有三条穿水蜿蜒的田

埂小路通向西北、北和东北三个方向。南面没有旱路，必须涉水而过方能到达彼岸。村东侧有个财神庙，是那时江宁县和龙都区经常开会的所在。

这个只有30多户农民的偏僻小村，虽然不为盘踞于龙都、秣陵关的日伪武装瞩目，但因其地形的特殊，一旦突遇敌情，必将对“运动”或“转移”构成不利。

三月下旬末，率领县警卫连和区大队约50名战士的强县长及县军事科长兼警卫连长许治、指导员蔡子荣、县政府秘书焦恭士、民政科长庞家义、龙都区区王齐贤、新四军46团参谋王晓培等，在邹家村附近的其它村庄开了两天的会，30日散会后，大家研究了当夜转移到何处宿营的问题。当时，庞家义建议把部队拉到距邹家村7~8华里以外的高阳桥宿营，他的理由是邹家村距龙都镇太近，容易被敌人发觉。但王齐贤说：“31日我们还要召开龙都、秣陵、殷巷三乡的乡、保长会议，这在邹家村是比较方便、适中的，而且，我们有警卫连执行警戒、保卫，不会有什么问题。”因而他坚持要宿营在邹家村。对此，蔡子荣等指出：警卫连扩建不久，未经过战斗考验，武器装备也差，而且新四军主力不在这里，为防万一，还是去高阳桥宿营为宜。王晓培亦持此见。

强县长在1942年1月才从丹南县长的任上调来江宁，对江宁的整体情况还在摸索、熟悉之中，所以在众说纷纭中，一时未作定论。但军事科长许治却一锤定音：“就住这里，怕什么！”强县长未加深思，也就同意了这个意见。当夜，除王晓培、庞家义因故未宿该村外，其余的人都在邹家村群众家里住下了。谁知，这一情况被龙都镇一个姓蒯的屠户知道了，他悄悄跑到秣陵关，向汪伪自卫团告了密。

31日拂晓，大雾弥漫。秣陵关的日军70余人和汪伪自卫团团长李宏堂率伪军30多人，趁黑包围了邹家村，在村东侧财神庙内和在村西路上放哨的两名哨兵都未察觉，直到敌人

从北面压过来进到村边时，才被起早放牛的村民徐智洪发现，他急忙喊了一声：“鬼子来了！”已经起床准备换岗的战士邹泰志听见，也连声高喊：“敌人来了！”人们闻声，纷纷跳下床来朝南突围，撤退。此时的许治没有立即组织部队阻击，却在慌乱中只身向南跑去，而敌人一面以密集的步枪和掷弹筒从背面猛射，一面又在村南架起机枪自正面扫射。在腹背受敌的情况下，区长王齐贤和几位撤出村庄不远的战士首先饮弹牺牲，焦恭士跑出了村子，却在掩护同志时涉水淹死在村西的一个水塘里。县长强博已经游过了村南大沟，不料被埋伏在沟北坟堆后的匪徒许标、杨圣怀、曹大松发现，曹大松首先开枪，强县长背部中弹，立即倒在血泊中。但就在这生命垂危的瞬间，他还用尽全身力量将携带的文件、钱包迅速塞进身边的塘泥里。三个匪徒追至他的身边，曹大松凶神恶煞地问：“你是什么人？”强县长大气凛然地说：“我是新四军！”话毕，他短短23岁的生命便献给了这片土地。

这就是江宁地区抗日战争史上以13位先烈的鲜血为代价的“邹家村事件”，是镌刻在江宁人民心中的可歌可泣的一页。

半个月后，制造这一事件的敌人就受到新四军46团的严惩，重新打开了江宁游击根据地的局面。

强博，原名蒋文林，江苏金坛县指前标乡庙圩村人。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，他放弃在吴江乡村师范的学业，回到家乡，以小学教师为职业宣传抗日。1938年奔向南昌新四军办事处并入了党，继之随军东进再回故乡，参与茅山抗日根据地的开辟及斗争，先在金坛县西南区抗敌委员会（主任钱震宇、副主任李钊）宣传股工作。他积极奔走，动员青年参军，很快发展了100余人，并带领这支小部队同日寇巧妙周旋，有力地打击了侵略者。

1939年，强博调新四军军部学习，结业后任中共丹南县委书记和丹南县长；至1942年1月调任江宁县县长。

纪念邹家村事件50周年

闪光的青春

——记焦恭士不平凡的一生

毛志良整理

五十年前，当抗日战争处于最艰苦的时候，我县龙都乡邹家村在1942年3月31日发生了一桩仅次于云台山、横山暴乱的重大事件。在这次事件中，抗日军民的13名干部战士不幸牺牲。抗日民主政府的秘书焦恭士就是其中之一。

焦恭士同志原籍安徽省当涂县。他的父亲焦利生早年从事邮政，先后在南陵、蚌埠、阜阳、泰州、镇阳关等地邮局任职，最后几年当了阜阳邮政局长，家庭生活比较宽裕。他有四子四女，焦恭士排行第五。焦老先生在阜阳去世后，家道中落。焦夫人王慧卿为抚养儿女，日夜绣花及做其他一些针线活以维持生计。

恭士同志生于1918年，从小聪明好学，成绩一直很好，妈妈挺喜欢他。在学校里他很活跃，象演戏、演讲竞赛、运动会等活动，他样样参加，而且在运动会上得过奖，在演讲会上，捧过银盾。在宣城师范学校他和同窗好友周迈、孙宗溶、朱传德经常向报纸副刊《谷风》投稿。

恭士同志还在童年时，革命就在他幼小的心灵中播下了种子。当他父亲在阜阳当局长时，正值国民党在安徽展开残酷的大屠杀，形势十分紧张。局里一个同事的妹妹是中国共产党地下党员，常来他家，以打麻将做掩护进行工作。有天晚上，她又来到焦家打麻将，待拂晓她要走时，不幸被国民党特务抓去了，没几天就遭到杀害。当她被五花大绑经过焦家门口时，恰

巧给焦恭士看见了，他不顾一切地冲上去哭闹叫姨，却眼看这位可敬的姨姨被人带走杀害了。残酷的斗争现实及烈士的英勇形象，在他幼小的心灵中打下了深深的烙印。

抗日战争前夕，全国很多青年学生激于义愤，在校内外宣传抗日。恭士的妹妹恭珍因参加抗日宣传活动被校长开除。恭士知道这事后气愤极了，他拿起一把菜刀要与校长拼命，他说：“日本鬼子侵占我们中国，这个校长却不准宣传抗日，还有一点良心吗！”还是母亲死活把他拦阻住，才没有出事。

抗日战争爆发后，母亲携带四个孩子到泾县娘家去避难。不久，新四军率八省健儿东进抗日，在泾县云岭设立军部。在高涨的革命气氛熏陶下，她本人也做了些对革命有益的工作，例如在“皖南事变”前，新四军的陈茂辉、洪沛霖、吕桂英、杨林等同志做秘密工作时，都先后住过她家，她并把五个儿女先后送到革命队伍。

南京失守后，宣城师范学校解散了。在这山河破碎、民族危亡系于一旦之秋，为了实现抗日救亡，焦恭士和同窗孙宗溶、朱传德三人跋山涉水、历尽艰辛到了武汉。通过他们的国文教员朱人瑞老师的引荐，1938年2月下旬，八路军武汉办事处批准他们三人赴延安抗大学习。他们于三月初到达延安，参加了抗大第四期学习，编到第四大队二中队。四月间，他们三人都参加了民族解放先锋队组织，六月下旬又同时入党。学习到最后一个多月，抗大开展学习竞赛，恭士同志被评为“突击手”。在抗大，他们和分队长、中队长相处得很好。这些老红军战士象老大哥一样，时时事事关怀、爱护和耐心地帮助他们。毛主席和中央其他首长给他们做过报告，讲过课；艾思奇、焦敏之、陈昌浩教过他们哲学、经济学、科学社会学……抗大这个革命战士的摇篮，加上领袖和权威教授们的辛勤抚育，使他们政治思想进一步得到升华。

1938年9月初，他们在抗大结业，三个人一同分配到皖南

军部。途经武汉，他们在八路军办事处听过周恩来副主席、以及董必武、李昌等同志的报告。这些报告进一步鼓舞他们树立了抗日必胜的信心。

从武汉到皖南，抗大同学沿途分配到各地，只剩下十几人了。八路军办事处分配一个护士队（负责人顾明同志——胡立教同志的夫人）以及薛暮桥夫妇和他们一道到皖南军部。他们一行沿浙赣路经屯溪，由岩寺、太平县直到泾县云岭军部。朱传德分到教导队，恭士与孙宗溶分到皖南特委做青年工作。当时的特委书记是李步新，青年部长是黄诚，在东南局的领导下，成立了苏浙皖赣民先总队部，总队长谢云辉，副总队长黄诚，恭士同志任训练部长。后来，特委又办了一期党员训练班，恭士同志担任教员。大约1939年初，恭士同志被调至苏南工作。

到了苏南，恭士同志先在新四军二支队三团工作。因为他文化程度高，部队分配他做文化教员，并常同支部民运科长王绍杰在地方上做一些民运工作。1939年三团调回皖南军部，恭士同志因工作需要留在四团。这年冬天，第一、二支队合并成立江南指挥部，陶勇同志带老四团的第一、二两个营去苏皖支队，恭士同志又奉命留在苏南。1940年3月，钟国楚、王直等同志组建新四团，恭士同志被任命为民运股副股长。“皖南事变”以后，新四团改编为新四军四十六团，他担任该团民运股长。

1940年10月江当溧地区刀会配合日、伪、顽阴谋搞了个“横山暴动”，敌伪乘机挤进横山，处处设防安据点，整个地区重新伪化，白色恐怖相当严重。地方上很多干部有的牺牲，有的被捕，有的逃跑，有的变节，更多的同志转到地下进行斗争。就在这次事变之前，四团派焦恭士率领夏希平、周廉、袁雪亮等人组成的工作组，到横山做群众工作，“横山事变”爆发后，工作组成员夏希平同志等人被围困在铜山好多日子，才

被恭士同志设法接到部队。

1941年下半年，由于地方干部人手不够，恭士同志就被留在江句溧县委工作，担任江句溧抗日民主政府秘书，他是县长强博的得力助手。

不久，1942年3月31日，江宁县又发生了一起重大事件——“邹家村事件”，事情经过是这样的：

江宁县抗日民主政府原决定3月31日在龙都附近邹家村——一个四面环水，只有一条通道的村子，召开龙都、秣陵、殷巷等地的乡、保长会议。为了便于次日开会，30日晚上就宿营在这个村上。由于有人告密，秣陵关日本宪兵队和伪自卫团长李宏堂的伪军等一百多人，于当天拂晓前包围了邹家村。据前江句县委书记陆纲同志于1953年“七一”前后在《新华日报》上写的纪念文章以及他对恭士的胞妹焦恭珍的亲口谈话：由于情况突然，干部、战士惊慌失措。焦恭士同志在阻击敌人、掩护战友突围中壮烈牺牲。县长强博、龙都区长王齐贤等十三人同时遇难。是年，焦恭士仅24岁。

我们在1983年5月9日曾在南京访问前福建军区副司令王直同志，王直同志在谈话中曾两次提到焦恭士，他说：

“焦恭士是四十六团的民运股长，四〇年分配来四团的，一年多以后在江宁地方工作。他牺牲时才二十多岁，是个好同志。”

“焦恭士在四十六团约一年多时间，那时我任十六旅的组织科长，这个同志很好，很活泼，文化程度较高，能写一笔好文章。”

焦恭士同志是个爱国青年，他把青春献给了抗日战争事业。他的爱国主义精神，永远值得我们学习！

（本文根据焦恭英、焦恭珍、孙宗溶、周迈、王直同志等的回忆整理。失实处，请指正。）

· 纪念邹家村事件五十周年 ·

在与焦恭士同志 共同战斗的日子里

夏希平

1940年上半年，我从江南指挥部调到新四军四团后，不久，就来到江宁县横山。首先接待我的是焦恭士同志，他穿着一件蓝上褂和一条黑裤子，一身便衣打扮。一眼看出，他是个精明干练的同志。

他带领我在铜山一带做民运工作，向沦陷区人民宣传抗日，组织抗日团体。我们每天起早摸黑，奔走在鬼子建立的梅花桩似的碉堡周围，危险随时随地都能遇到。但在焦恭士同志沉着冷静的应付下，我们都能化险为夷地闯过，安全地到达目的地。

记得有一次，我和焦恭士二人刚走出公路不到二百米的地方，突然鬼子的小汽车从后面开来了。几个鬼子高高地站在架机枪的地方，向着我们扫射，枪声划破寂静的长空，子弹在我

们头顶上呼啸而过。这时焦恭士同志走在前面，我跟在后面。怎么办？我放眼看去，两边麦田里正翻腾着金黄的麦浪，这里是立即隐蔽的好地方。焦恭士却镇定嘱咐我“不要慌，慢慢走！”，“千万不能慌‘要慢走，慢走……’”听了他的话，我立即镇定下来，只顾向前慢慢地走着，任凭机枪“嗒嗒嗒”地响，子弹在我们头顶上呼啸而过。好长一会，机枪声停了，鬼子的汽车远了，我们也安全地到达了目的地。这使我由衷地佩服恭士同志判断的正确和胆大心细。

在铜山，起先只有我和焦恭士二人，后来渐渐增加了一些新参加工作的同志，有周廉、袁雪亮、毛玉卿、刘润华、严联科、李青等共三十六人。当时成立了一个工作队，黄坡和焦恭

士同志指定我担任队长。我们每天出去访问、宣传，成立了农抗会、妇救会和儿童团，同时在每个村子里建立了递步哨。这样，日本鬼子一出动，我们就能很快得到消息，事前作好战斗准备，因而避免了不应有的损失。这使我更加佩服恭士同志经常讲的话：我们要在鬼子的心脏——南京城郊开展抗日工作，就得发动群众，依靠群众！

我们在工作中，焦恭士同志更是带头执行“三大纪律八项注意”。几乎每次会议上，他都要反复强调工作人员不能损害群众利益。要百分之百地做到“秋毫无犯”！有一次我们工作队的一位同志，在老百姓家中不小心踩死一只刚出壳十天的雏鸡，那位同志要赔偿，但大娘执意不要。后来焦恭士同志知道了这事，立即要我带这位同志一起到大娘家道歉，并且赔了二角钱。这位大娘逢人便说：“新四军同志多好！他们出来打鬼子够苦的了，踩死我家一只小鸡，还赔二毛钱，这种好人哪里去找！”

通过这些教育，大家对群众纪律更加重视了，和群众的关系也更加密切了，我们在铜山的抗日工作也蓬蓬勃勃地开展起来了。

焦恭士同志是高中毕业生，1938年由安徽铜陵到延安参加学习，后来分到安徽泾县新四军战地服务团，由战地服务团来到横山做民运工作。他个性内向，平时沉默寡言，但在安排工作上和在处理或总结工作中，却考虑得很周到，遇到问题，总是帮助大家详细分析情况，提出解决办法。我们工作队在他领导下，个个积极性很高，不怕苦，不怕累，热天、雨天都挨家挨户去宣传动员抗日，使群众明白了齐心合力起来打鬼子，中国才能得到胜利的道理。

在皖南事变前，敌伪加紧对我们扫荡，发生了有名的“横山事件”。我和工作队的李青、刘润华三人被围在铜山脚下，

（下转15页）

纪念邹家村事件50周年.....

忆 恭 士

· 周 迈 ·

1934年秋，我在安庆一中毕业后，考进了宣城师范学校。焦恭士比我低一年级，是1935年秋进宣师的，我们一起度过了两个春秋，时间虽短，有些事还是很值得回忆。

这时期，正是日寇大举侵略东北华北，国民党忙于“围剿”红军之际，全国要求抗日、要求民主的呼声此起彼伏。知识青年都在思考民族的命运和个人的前途。何去何从，正处在十字路口！

宣师的前身是安徽四中，据说很“红”。但我到那里，国民党派来了军训教官。校园空气沉闷，只听说从四中分出去独立的宣城四中校园围墙外有人散发传单，宣师也酝酿过罢课的事。我和恭士最初在网球场上认识的，那时我为了挽救自己病弱的身体，每天在附小门前拼命打网球，恭士是日常球友之一。但我与他接触最多，友谊渐增的场所，则是学校的图书馆。当时学校有个一百多平方米的图书馆，好多同学一下课就跑进去看报刊。恭士常与我碰在一起。图书馆各种各样书刊都有一些。《共产主义ABC》，我就是第一次在这里看到的。在杂志中，我最感兴趣的是邹韬奋办的《生活周刊》，觉得它敢讲敢说，讲了人们心里话，说得有理，骂得痛快，使我们心里也萌发了对黑暗社会口诛笔伐的念头。报纸方面，我和恭士常看的是《申报》、《大公报》。有关国内消息，我们往往从“天窗”（当时报纸不准或不敢刊出的新闻文字，用方空格省略掉，名曰开天窗）中去推测红军的踪迹和各处发生的事件，有时从几个、十几个以至几十个“天窗”中发现一些疑问，就

提出来议论一番。这是我与恭士等在图书馆常有的事。其实我们都很幼稚，很少政党知识、政治认识，只有一种强烈而模糊的不满现实、要求抗日、要求民主和清除腐败的善良愿望而已。但我们都从“天窗”中看出云缝里一线阳光，模糊地寄希望于多次宣传已被消灭而又多次出现的“朱毛红军”，因为打了它多少年总是打不完，其中必有道理！至于道理何在，实在是心中无底！

学校里虽说表面上风平浪静，但同学们的思想并未停止跳动。记不清是在什么时候，出现了一些学生办的墙报，全校还在大礼堂（一座庙堂改装的）举办了一个学生演讲比赛，就是在这次会上，我第一次发现恭士的演讲才能，他口齿清晰有力，声调抑扬顿挫，给我留下极好印象。在一些墙报诱导下，我，恭士还有一些要好的同学约20人，由我当社长，组织了一个“谷风社”。这个社名是我起的，有“山谷来风、横扫大地”之意，“谷风社”也办了一两次讲演会，地点在那两层共四间教室的楼下一间，记得国文老师朱人瑞有一次也参加了。“谷风社”后来记不起由哪位老师介绍，还在芜湖一家日报上出了副刊，刊名就是“谷风”。我用笔名（戈白或是白戈）在《谷风》上写过两篇文章，不外是主张抗日，内部不要闹，哪个意见对就照哪个办之类的天真话。恭士也在上面写过类似文章。“谷风”只办了三、四期，报社就来信说不再出了，不久，“谷风社”就宣告散伙。

1937年夏，我毕业，面临着毕业即失业的问题，“谷风社”的好友十人左右（有恭士、孙宗溶、聂汉沅等）在宣师鳌峰公园踏着月色散步，便走便谈，议论起国家大事和个人前途来。由于当时环境使然，虽属好友，各人心里的话只是隐若、委婉地吐露出来，但一致的一点是：国民党无论如何不行，共产党可能是新生的、有希望的力量。这就是恭士与我最后一次的谈话，也是最后一次见面。

我师范毕业后去徽州中学附小教书，恭士等仍留校读书。不久，日寇轰炸了宣师，师生大部分各奔东西，听说后又迁校。恭士辗转到了武汉，与孙宗溶、朱传德一起由国文老师朱人瑞介绍去了延安。我们在宣师分手时，一些要好的同学都留有通讯地址。恭士等入延安抗大后，即通过我老家与我取得了联系，音讯不断。1938年夏，恭士与孙宗溶、朱传德由延安分配来皖南，事先与我约好一同去新四军，因在岩寺兵站未见到面，我遇上一个初中要好同学，听了他的诬言，误入了国民党反动部队，但仍保持着与在新四军军部的恭士等的通讯。1939年反共高潮掀起后，我几经周折，历尽艰险，最后逃脱虎口，于1943年夏分配到江宁县秦淮区当区长，这才得知恭士已在前一年牺牲于秦淮区境内。呜呼，恭士！三年同窗，一朝分手，竟成永诀！再过一年，我正巧分配到你牺牲的地方，踏着你的血迹继续战斗！现在又过去五十年了，中国已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，你看到这样崭新的面貌，也当告慰于地下了。这里，再为诗一首以吊：

宛陵旧事梦遄飞，	内外纷纭国是非。
十字街头蒙宿雾，	“天窗”“缝里”望朝晖。
贤师遥指延安塔，	军令长驱白下畿。
突破樊篱新政建，	宣扬正义众心归。
群英夜聚谋戎略，	村舍晨炊受敌围。
三面环沟弹落雨，	几番反击血沾衣。
待到我来君已去，	纵然心碎泪不挥。
如今五十春秋过，	大地花开遍野肥。

（上接12页）但在群众的热情保护下，我们都安然脱险了。后来我调到二支队政治部工作，在工作中我还常常想起恭士同志艰苦奋斗和扎实工作的作风。没有想到在一次邹家村事件中，恭士同志被鬼子包围而牺牲了。这虽然距今五十年了，但他崇高品德和艰苦奋斗的作风，却至今仍留在我的记忆里。焦恭士同志是我永远学习的榜样，也是后人值得纪念的楷模！